

20_{世纪}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湖北教育出版社

周勋初/编

李白研究

20_{世纪}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周勋初/编

李白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白研究/周勋初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2
(20 世纪中国学术文存/陈平原主编)
ISBN 7-5351-3542-0

I. 李… II. 周… III. ①李白(701~762)-文学研究-文集②李白(701~762)-人物研究-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3891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 027-83619605
邮购电话: 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441021·湖北襄樊盛丰路 45 号)

开 本:850mm×1168mm 1/32

5 插页 16.5 印张

版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406 千字

印数:1-2 000

ISBN 7-5351-3542-0/I·125

定价:27.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说 明

一、为了弘扬学术、传承文化,我们推出了大型丛书《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以下简称为《文存》)。

二、《文存》是一套集多学科、多层次、多卷本而成的20世纪学术研究成果精华库,其每一卷都主要由三部分组成:导论、文选、目录索引,三者互为呼应。

三、《文存》中的“导论”和“目录索引”部分,均按现行的出版标准和规范进行排印。

四、对《文存》中的“文选”部分,需作如下说明:

1. 选文的时间范围:上限为1901年,下限为2000年;
2. 选文的地域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原创之作,对国外的原创之作不作统一要求;
3. 对所有入选的作品,一律采取简体横排;
4. 将原载中带有注码的注释统一改为篇末注,对括号内的夹注也进行了版式统一;

5. 对原载中的直接引文进行了版式统一；

6. 对原载中的标点符号(尤其是书名号、引号等)进行了版式统一；

7. 由于入选文章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语言规范不一致,故对其原载文字不进行整体上的统一,也不一一校勘;这样既可以反映学术史的真实,同时也尊重了原文,保持了原貌,从而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8. 出于篇幅的考虑,少数长篇论文或论著进入《文存》时采取了节选的方式,并予以注明;节选部分的章节序码也完全依照原载;

9. 由于一些不可克服的原因,对少数经典论文采取了存目的方式。

五、特此说明,敬请广大读者鉴识。

总 序

陈平原

给 20 世纪中国学术做总结,此举曾被毫不犹豫地断为“狂妄”(因当初对此项工作感兴趣者,多非博学鸿儒);没想到风云变幻,才几年时间,“学术史”竟成了时尚话题。于是,又有高人出面冷嘲热讽——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摆弄那些“老古董”。如此一波三折,宏图尚未真正展开,已被中国学界“消费”得差不多了。其实,学术史研究之回首往事,既倍感痛苦,又进展缓慢,吃力不讨好,难怪其“风声大,雨点小”。对于踌躇满志、正忙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界来说,最响亮的口号,依然是“拿来主义”。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不退却,也不追随”的性格,有如下描述:“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这种夹带着血与泪的“挣扎”,不同于世人之动辄“幡然悔悟”,因其有切肤之痛,步子可能迈得更坚实些。如果不避拉大旗做虎皮之讥,我愿意将此思路移用于今日之学术史研究。表面上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性选择,而我更看好的,却是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似乎痛快淋漓;身处其中者,则不无鲁迅“抉心自食”的意味。所谓自省,既针对整个学界,更针对学者本人,这也是我再三说的,对有志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过程”可能远比“结果”重要。

以“文存”而不是“通史”的方式立说,有便利读者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挑战目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来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与其写一部屡经稀释的百八十万字的“通史”,不如老老实实,讲完自家的点滴体会,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这里奉献的每册图书,均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的“索引”三部分。“导论”见史识,“索引”显功夫,“文选”部分则在对先贤表达敬意的同时,为后来者提供阅读及研究的方便。

“导论”的责任,主要不是表彰优秀论文,而是准确勾勒本专题在 20 世纪中国的兴衰起伏,因而,更像是一部采取特定视角的具体而微的学术史。如此定位,要求研究者不仅有历史感,更应具前瞻性。说到底,论者透视历史的深度,与其展望未来的能力成正比。学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意识”,决定了本丛书的工作目标:既须“史”的深厚,又兼有“论”的新锐。

至于选题的原则,暂时局限在“人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研究”。所选专题,要求以往的研究成绩显著,思路清晰,而且至今仍能吸引学界的眼光。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选题最好是不大不小,不新不旧——太小学术容量有限,太大则无从把握;太旧不能吸引今人目光,太新则没有历史积累。

以“选本”带“综述”的形式,总结 20 世纪中国学术进程的某一侧面,乃本丛书的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导论”、“文选”、“索引”三者,呈鼎立之势,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相对来说,前后二者定位明确,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反而是中间部分难以处理。在同一专题成千上万的论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寥寥数十则,实非易事;更何况,这些选文除本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必须能大略显示学问推进的轨迹。百年文章,本就迭有变迁,再加上选录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地区的原创之作,如此体式纷纭,若强求一律,必定伤筋动骨。故对所收各文,除进行必要的版式统一(如简体横排、篇末注等)之外,其他

则尽量尊重原文保持原貌,这样既反映了学术史的真实,也能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本丛书之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工作,虽不属如今大受推崇的“个人专著”,但借此勾勒出 20 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若干面影,并给后来者的入门提供绝大方便,在我看来,“功莫大焉”。

2001 年 11 月 17 日于京北西三旗



总序/陈平原	1
李白研究百年回眸/周勔初	1

李白研究论文荟萃

李太白氏族之疑问(存目)/陈寅恪	56
李太白的国籍问题/胡怀琛	57
李白家世考异/詹 锓	66
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俞平伯	79
李白出生于中亚碎叶/郭沫若	90
李白两入长安辨/稗 山	104
李白三入长安别考/安 旗	114
李白漫游的经济来源/乔象钟	130
吴筠荐李白说辨疑/郁贤皓	151
李白郭子仪互救辨讹/詹 锓	164
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郁贤皓	167
李白流夜郎的法律分析/张才良	183

诗人李白/林庚	198
李白的“相如情结”/赵昌平	222
李白的文艺造诣与谢朓/李长之	234
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袁行霈	241
蜀文化与陈子昂、李白/贾晋华	257
李白与《菩萨蛮》/杨宪益	280
李白剔骨葬友的文化背景之考察/周勋初	287
李白两次就婚相府所铸成的家庭悲剧/周勋初	300
李白的神仙道教信仰/罗宗强	320
说李/玄修	334
李杜诗之比较/胡小石	353
李白与魏晋南北朝时期诗人/裴斐	360
论李白乐府的复与变/葛晓音	379
论李诗的艺术风格/罗宗强	395
杂言体:李白最独树一帜的诗歌体式/施逢雨	412
谈李白的《蜀道难》/王运熙	446
谈一首讹字最多的李白名诗——《静夜思》/薛顺雄	451
李白《送贺监归四明应制》诗为伪作/陶敏	459
略论清人王琦的《李太白集辑注》/朱金城	467
古集原载词二首 遗韵曾传魏夫人 ——李白词二首新证/葛景春	479
谈兖州近年出土的四件文物及其对 “李白在兖州”研究的实证/武秀	486
20世纪李白研究论著目录索引	493

李白研究百年回眸

周勳初

我们站在 21 世纪开端,回顾 20 世纪中国的发展,总是感到变化特大,超过了中国五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

1901 年,正值清光绪二十七年,清廷推行新政,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文,改用策论,并命各省于省城及各州县筹设高等、中等、初等学堂,又命选派学生出国留学,中国知识分子的面貌由此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十年之后,清廷覆灭,民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种新的政治体制,随后则又发生了北洋军阀间的内战。1926 年时,国民党初步统一了全国,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但不到十年,日本即入侵中国,随之发生了八年抗战。1945 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接着又发生了解放战争,三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们如以 1950 年为界,可将 20 世纪分为上下两个阶段。前 50 年,封建主义逐步向资本主义转变,学术界的情况也一样,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急速衰退,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渐次上升至主导地位。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李白的为人和创作,得到了多方面的系统的阐发,前后产生了好几种专著。后 50 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主导下,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并以无产阶级的学术思想取而代之。这次转变的过程发展得

比较急遽。上面有政府的驱策,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大家都得努力掌握新的思想和新的方法。但是一些学者运用新观点和新方法而得出的成果,也不一定都很完美。因为其时的主导思想,名为唯物主义世界观,但因过分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对意识形态中的复杂情况每作简单化的处理,一切问题都要进行阶级分析,突出阶级对立和阶级冲突,有些文类,如山水诗、咏物诗、游仙诗等,就难以处理。学者们虽说采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但内多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成分,时而流为庸俗社会学,因而有些李白研究的文字,其面貌虽与前有异,实则未必更见科学。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阶段。西方的各种文学思潮和理论不再囿于苏联文艺学一种,而是各种新旧思想纷至沓来,李白研究的专家可就个人的爱好与特长采用多种方法进行分析,这一领域重又出现了活泼的局面。

这篇百年回眸,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为鸟瞰式的回顾;中编介绍李白的族系之争,因为这是牵涉到国家利益事关全民的大事,故单独列为一编;下编列出若干专题,一一加以探讨。

上编 20世纪李白研究鸟瞰

清末传统学风——诗话式的批评

清末民初,未见研究李白的专著与专题论文。学者间或涉笔,常是见诸吟咏,或是采用传统的诗话形式,发表一些感想。

玄修作《说李》,情况类同,也是一种诗话式的批评,但形式上有了一些变化。他先摘引前人之说,然后加上按语,或申论,或批驳,发表个人的研究心得。

兹举一例以明之。他先引宋代黄彻《碧溪诗话》云:

世俗夸太白赐床调羹为荣，力士脱靴为勇，愚观唐宗渠渠于白，岂真乐道下贤者哉？其意急得艳词媒语以悦妇人耳。白之论撰，亦不过为玉楼金殿、鸳鸯翡翠等语，社稷苍生何赖？就使滑稽傲世，然东方生不忘纳谏，况黄屋既为之屈乎。说者谓以谋谟潜密，历考全集，爱国忧民之心，如子美语，一何鲜也。力士闺阁腐庸，惟恐不当人主意，挟主势驱之，何所不可，脱靴乃其职也。自退之为蚍蜉撼大木之喻，遂使后学吞声。余窃谓如论其文章豪逸，真一代伟人，如论其心术事业，可施廊庙，李杜齐名，真忝窃也。

后加按语曰：

太白《官中行乐词》其第二首，以飞燕比杨妃，正是讽刺之意。第三首末云：“君王多乐事，还与万方同。”用孟子当与民同乐之意。第四首用玉树后庭，亦含讽刺。且太白正以“飞燕在昭阳”一语为高力士所譖，致终身不得官，其论诗以复古道为主，不屑屑于梁陈以来轻艳之词。玄宗诏为官中行乐词，亦正以其薄视声律，而欲试以所短以戏之。谓玄宗欲得艳词，以悦妇人，是也，而责白此际之诗，应有补于苍生社稷，岂不迂哉！孟桀《本事诗》记此甚详，录之于后。^①

接着他就征引了孟桀《本事诗》的原文。这种研究方式，层次井然，见解明确；可供他人参考。虽其表达方式有异于后人的逐层推进，但如把他的观点和例证打乱后重新组合，也就可以改写成近代式的论文了。

王国维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国粹学报》上发表《人间词话》六十四则，建立了一种新的美学体系，其形式则是传统的。他以“境界”论词，而评李白则以气象论：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②

后人推崇李白之作充分地体现了盛唐气象，当受这种理论的启发。

民国时期的研究——多样化的批评

民国时期的李白研究，要以族系问题的探讨影响为大。李白为胡人说提出后，学界普遍表示接受^③。其后有孙楷第提出《唐宗室与李白》一文，对李白家族的由来进行推测^④。这一问题，贯彻 20 世纪始末，因其涉及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发生的影响，已经超出文学领域，而牵涉到中国整个知识界。因此我将这一重大问题放在中编，作专题讨论。

其时产生的几种研究著作，如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⑤，汪静之的《李杜研究》^⑥，致力于两大诗人的比较研究，即使其他几种仅标题为李白研究的著作，也把很多篇幅放在二人的比较研究上。李白重视乐府诗与古诗的写作，故研究者大都强调他重继承的一面，从而阐述他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关系。杜甫重今体，在律诗的创作上有很多新创与发展，故研究者大都强调他的革新精神与开拓能力。这方面的文字，要以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一文阐述得最为酣畅^⑦。

这一时期，文人思想上无所约束，各人信笔所至，每就个人见解所及，对李白的一个侧面进行分析，或以之作为李白的特点而为之定性。如崔宪家作《浪漫主义的诗人李白》，突出说明其性格中浪漫的一面^⑧；徐嘉瑞作《颓废派之文人李白》，则突出李白的酒色之嗜和厌世思想^⑨；李长之作《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则从道家的特征推阐李白的为人与创作特点^⑩。李著是这一时期论述较为充分影

响较大的一部专著。

总的看来,民国时期的李白研究涉及的面已很广泛,后人一般仍是在这些问题上进行阐述,但因此时学术界投入的力量不是很多,积累还不丰厚,因而水平高的论文与著作还不多见。

建国初期——有关李白作品中人民性的探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术界的情况起了很大的变化。政府起主导作用,督促知识分子改变立场,进行思想改造。他们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用来观察问题与分析问题。这样,李白研究的领域内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林庚于1954年发表了《诗人李白》一文,提出了很多新的观点,随之引起热烈的讨论,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①。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了适应时代而在立场观点上正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这时考察一个人的立场,最重阶级出身。林庚在《李白的出身与阶级矛盾中的民主要求》一节中说:“李白的出身,记而不详。”但绝不是地主家庭,其父“也没有作过官。在封建社会中既不是地主,又不是官,那就是最彻底的平民了”。而据前此的研究,以为“李白的父亲大约正是一个客商,换句话说李白的出身就近于一个市民阶级”。他对李白定性之后,随之对其创作特点展开了一系列的阐发。

50年代的中国,干部队伍中,包括教师在内,都得进行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中心内容即为社会发展五阶段论。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所取代,资本主义也将为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推翻封建制度的主力,是劳动人民,而从社会发展史的观点来说,市民阶级起了重要作用。李白既是市民阶级中的一员,不也代表社会前进方向了么?

李白的出身虽然不坏,但绝非劳动人民,只能是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因此林庚强调“李白终身是一个布衣”。李白的先进思想与伟

大创造,都与他特殊的布衣身分有关。但他“所受于市民阶级的影响,当然也有其庸俗的一面”。这是当时常见的一分为二的观点的运用。

为了给李白正确定性,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举行了三次会议,除本室人员外,还邀请了系外和校外的一些权威人士参加,如何其芳、赵树理等人,是从延安老区过来的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对于解决文艺上的复杂问题,当然具有更大的发言权。

大家认为,对李白其人自当肯定。当时颇重二分法,首先对人要有肯定与否定的总体评价。在此基础上,大家对林文中的艺术分析与爱国主义部分也都加以肯定,但对文中的一些主要提法,如对“布衣”的评价,则认为不能把“布衣”想参加政权说成和农民起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有人更指出“布衣斗争”的性质只是希望爬上政治舞台,加入统治集团,没有多大的革命性。可见大家对李白“革命”的尺度把握得很紧,绝对防止和农民起义相混淆。

赵树理认为:李白诗中为人民说话的地方就是他富有人民性的地方,是可以肯定的。“人民性”一词在苏联文艺学中占重要位置,它可以解决很多尖锐的棘手问题,出身于剥削阶级的作家如在作品中反映了人民的某种愿望或爱好,也就可以被认为具有人民性,其作品也可以纳入优秀作品的行列。这就为历史上众多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文人找到了肯定他们作品的根据,因而为中国学术界广泛采用。其后的李白研究,在提到他的种种好处时,经常在“人民性”这一普遍适用的范畴内进行。

林庚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对李白诗歌的艺术性作了很多精到的分析,随后又撰专文论证李诗最充分地体现了盛唐气象^⑩。这一观点后为广大的李白研究者所接受。尽管有的学者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李白之时唐朝已趋衰殆,因而谈不上什么盛唐气象。只是李白、杜甫等人都对“开元全盛日”有很多歌颂,后人又怎能仅凭个别资料来推翻当时人的感受。这些商榷文字,说不上有多大道理。

60年代,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组织人员集体编写了两种《中国文学史》,其中有关李白的部分,结论大体相同,可以视为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调整工作已告完成。其中由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因为是高等学校统一使用的教材,更能体现这一时期主流的价值判断^⑬。

游国恩等首先指出:“随着天宝年间政治的日益黑暗,他揭露现实的作品愈来愈多,反抗精神也愈来愈强烈,成为他这一时期创作的显著特色。”“三年的翰林供奉,使天真的诗人李白初步认识到统治集团的腐朽和现实的黑暗,开始写出一些抒发愤懑,抨击现实的诗篇。”

这部《中国文学史》以《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作为章名。“他的政治上的远大抱负,他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权贵势力,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和羁束毫不调和的叛逆态度,正是他诗歌浪漫主义精神的主要表现。……当然,由于内容性质、感情色彩以及表现手法的不同,他有一些作品可以说是现实主义的,例如那些描绘揭露黑暗现实面貌、幻想成分较少的作品就属于这一类。”可知这时的古代文学研究,着眼于论证作家的爱国主义,揭露政治黑暗,因而从大处来看,许多作家的面貌差不多,李白只是在幻想方面突出一些就是了。书中分析到最后,仍是不忘指出诗中有“消极的糟粕”,这也是对精华、糟粕论的普遍应用。

《中国文学史》的编者指出:“李白究竟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诗人,他的理想,无法超越他的时代和阶级视野的限制;他的反抗,也更多是针对他阶级内部的黑暗现象,针对妨碍他个人自由发展的那些压迫和束缚。他的要求和当时人民的利益有一定相通的地方,但和人民的要求本质上也有区别。”这番话,也不能说不不对,但对其他诗人大体都适用,因此难免给人以泛泛而论的感觉。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⑭,有一些新的提法,如言李白有个性解放的要求和人道主义精